

新中国初期的卫生宣教工作

□ 李自典

新中国成立伊始，为改变落后的卫生局面，政务院成立卫生部，领导全国的卫生事业，确立了卫生工作的四大方针：面向工农兵、预防为主、团结中西医、卫生工作群众运动相结合。国家有关卫生工作的方针、政策定下来后，如何贯彻落实到位，卫生宣教工作发挥了重要作用，促进了民众健康水平的提高，对广大民众生活产生了深远影响。

政府主导,力量多元

设立专业卫生宣传机构，配备工作人员，为卫生宣教工作开展提供基础保障。20世纪50年代初，卫生部首先组建了卫生宣传处，管理全国卫生宣传教育工作。其后，在省、市、自治区先后普遍设立卫生宣传教育所、馆；县以上的卫生防疫站设立卫生宣传科（室）；医院、妇幼保健机构和地方病、职业病等防治机构也没有专人或由防保科（室）兼管卫生宣传教育工作。1952年爱国卫生运动兴起后，中央爱国卫生运动委员会办公室下设宣传组，负责开展爱国卫生运动的宣传工作。这些卫生工作人员是开展卫生宣教的主力军，在普及卫生知识，发动群众讲究卫生、预防疾病方面，发挥了积极作用。

大力吸收社会力量，与卫生宣教专业人员协同合作，多元互助，成为推动卫生宣教工作不断进展的重要支撑。开展卫生宣教工作，除了卫生系统内的宣传机构外，文化、教育、科学、新闻、出版等有关部门都发挥各自的职能，运用不同的方式，将党和国家的卫生工作方针、政策以及一般的医药卫生知识传播到民众中。此外，工交、农林、商业、服务行业等部门及工会、共青团、妇联、红十字会等群众团体，也都积极支持卫生宣教工作，配合开展各种宣传活动。领导带头参与卫生宣传，起到典型示范的效果。全国各省、市、自治区和卫生厅（局）的领导干部为宣传卫生工作方针和政策措施，有的亲自向群众讲演、作报告，有的还参加现场宣传活动。如北京市副市长王昆仑、北京市爱国卫生运动委员会主任顾德、北京市公共卫生局局长严镜清等人，都曾亲赴街头进行讲演。领导干部的带头宣传，有效推动了全民参与卫生活动的热潮。

宣教形式多种多样

利用报纸、杂志及书籍、图画小册子等纸质媒体宣传卫生方针、政策、相关新闻报道以及卫生常识等内

容。《人民日报》《光明日报》《健康报》等报刊都曾大量刊发有关卫生工作的报道文章，在传达政策法规、介绍先进工作经验和宣传卫生科学常识上起到积极作用。此外，在1959年的小学语文和自然课本中，也有向广大学生灌输卫生防疫知识、启发学生培养卫生习惯方面的内容。卫生宣传画以其色彩亮丽、通俗易懂等特点，很受群众欢迎，在卫生宣传中发挥了广泛传播的作用。据统计，在新中国最初的5年间，仅北京一地就印出了1100多万份卫生宣传画。这些宣传画涉及痘痘、灭虱灭蝇、预防注射、食品卫生等多个主题，既讲知识，又教办法，为推动传染病防治工作进展提供了大力支持。

通过广播、电视、电影、幻灯以及文艺演出等形式，把卫生知识艺术化地传播于民众中。例如，1961年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专门设立了《讲卫生》节目，其内容涉及各种卫生知识、疾病预防措施和治疗方法、祖国医学新成就等。该节目讲解亲切，听众很多，各地方广播电台都按时安排转播。电视、电影、幻灯以图文并茂的形式，配以文字说明，在进行卫生宣教时形象生动，深受群众欢迎。1959年前后，北京市卫生教育所拍摄了《不要随地吐痰》等30余部影片，加上中央卫生教育所拍摄的《预防感冒》《预防麻疹》《预防白喉》等影片，共80余部，对提高民众认识具有重要作用。

利用壁报、展览、传单标语等形式开展卫生宣传，也是最为普遍和深入的宣教方法之一。在新中国成立初期，为大力开展卫生建设，无论在城市或农村，随时随地都可见到有关卫生宣传的壁报、标语，非常醒目直观地将卫生政策及有关知识传达给民众。定期或不定期举办的卫生文化知识展览，综合了图画照片、文字说明讲解等多种宣传手段，既有综合性的展示，也有卫生专题展览，这在各地也备受群众喜欢。例如，1952年1月，北京市在中山公园举办全国第一次爱国卫生运动展览，有图片、实物、标本，捕鼠、灭蚊、灭蝇方法的文字说明，还有数十台显微镜。

通过演讲、报告会、座谈会等形式，开展面对面的直接宣讲，既传递了卫生知识，也密切了同人民群众的联系。例如，南京市在爱国卫生运动中，组织广大的家庭妇女和社会青年结成读报组，通过与居民座谈、开展读报活动等形式，在群众中进行了较为深入的卫生宣教。此外，还有些卫生人员、宣传人员在田间地头、街巷等地边检查工作，边开展口头宣传，于细微之处将卫生知识深入传播开来。

卫生宣教效果多重

卫生文化宣教活动在社会上掀起了一场讲究卫生、消灭疾病的热潮，直接推动了卫生运动的深入发展，促进了全国卫生状况的巨大改观，也提高了民众的健康水平。据1958年的不完全统计，全国清除垃圾295亿吨，疏通沟渠长达165万公里，新建和改建厕所8500余万个。随着除四害、讲卫生和积极防治传染病工作的推进，人民的健康水平得到一定程度的提高。全国各地民众的平均期望寿命有了显著的提高。在北京，人口平均期望寿命1950年为52.84岁，到1964年增至70.59岁。

卫生宣教活动的开展，带动了民众卫生观念的转变，开始破除旧有的迷信思想，相信卫生科学，开始改变原有的不讲卫生的习惯，逐步养成讲求卫生的习俗，使民众的生活状态发生了潜移默化的演变，起到移风易俗的作用。在开展除四害、讲卫生运动中，北京市进行过一次调查，访问了3万多个老幼居民，95%都知道四害的名字和为什么要除四害。由此可见卫生宣教对改变民众观念的重要影响。

卫生宣教活动的开展，从一个侧面丰富了文化创作的内容，推动产生诸多具有鲜明时代特征的卫生文化艺术作品，推动了国家文化建设的发展。据不完全统计，到1953年，全国共出版卫生宣传通俗小册子及画刊共计4000万册；挂图和招贴画共计4500万份；幻灯片共计23000多套；举办展览会13700多次；放映幻灯43400多册，组织讲演会754000多次，用黑板报宣传143000多次。

新中国成立初期开展的卫生宣教工作，使城乡各个角落的社会民众广泛地受到教育，提高了思想认识，积极热烈地参加到卫生运动中来，直接推动了卫生工作的顺利开展。

E-mail: f5@studytimes.cn
Tel: 010-68922368

地处黑龙江省牡丹江市林口县的乌斯浑河，千百年来默默哺育着生活在这片土地上的人们。它发源于锅盔山，在满语中有“凶狠的河流”之意。抗日战争时期，在这条裹挟着侵华日军罪恶子弹的凶狠之河中，东北抗联八位女战士为了掩护队友，誓死抵抗日军，打到弹尽援绝、宁死不屈，最终英勇投江、壮烈殉国。

如今，在乌斯浑河畔，八位女战士的塑像一字排开，一座高10米的纪念碑迎风矗立，“八女英魂 光照千秋”8个大字，映照着她们青春的面庞，也映照着她们用生命守护的土地。当地政府为了纪念八女投江的英雄事迹，修建了纪念碑和纪念馆。纪念碑背面雕刻有《八女投江殉难地志铭》，内容如下：

东北抗日联军第五军在指导员冷云同志率领下，有杨贵珍、安顺福、胡秀芝、郭桂琴、黄桂清、王惠民、李凤善八位女战士，于一九三八年十月在此地与日寇英勇作战，投江殉国，为缅怀先烈教育后代，特立此碑，以誌纪念。

碑文仅百余字，简要记叙了东北抗日联军八位女战士在东北抗联西征途中，与日本侵略者英勇作战，终因寡不敌众而投江殉国的惨烈经过，阐述了立碑纪念的缘由，读来令人动容并肃然起敬。

（一）

1938年，东北抗战进入最艰苦时期，八位女战士所在的东北抗联第四军、第五军因形势需要开始西征。10月下旬，冷云等八位女战士随部队行军到达牡丹江支流的乌斯浑河边，准备从这里渡河，寻找东北抗联第二路军总部和第五军联络部。拂晓时分，冷云她们刚要下水渡河，突然枪声大作，潜伏的日伪军发动猛烈的攻击，战斗异常激烈。东北抗联部队在河边仓促应战，地形很不利。队伍边还击

八女英魂 光照千秋

——八女投江纪念碑碑文敬读

□ 曲晓溪 李欣弋

边撤向西边的柞木岗子密林中，而冷云等八位女战士却没被敌人发现，被隔在岸边。关键时刻，八位女战士将生的希望留给别人，把死的危险留给自己。她们果敢行动，毅然开火，给东北抗联大部队创造突围的有利条件，使大部队很快摆脱敌人，进入密林。敌人气急败坏地掉转枪口，向岸边扑来。八位女战士被封锁在河岸边，后退无路，很快弹尽援绝。前面是穷凶极恶的敌人，背后是波涛汹涌的河水。面对绝境，八位女战士毫不畏惧，她们将手中最后几颗手榴弹投向敌人，背起受伤的战友，相互搀扶着，毅然决然地投入波涛汹涌的乌斯浑河。因河流湍急，水深浪大，八位女战士溯江捐躯，壮烈殉国。

八位女战士用鲜血和生命捍卫了民族的尊严，她们是东北抗联的英雄，是中华民族脊梁。正是千千万万个中华儿女，与日本侵略者进行了一次次惊心动魄的殊死较量，以其宁死不屈、舍生忘死的坚强意志和民族气节，创造出“战争史上的奇观，中华民族的壮举，惊天动地的伟业”，书写了中华民族史册上辉煌璀璨的一页。

（二）

八位女战士牺牲时，年龄最大的冷云只有23岁，年龄最小的王惠民才13岁。

冷云，原名郑志民，1915年出生，黑龙江省桦川县人。1931年入桦川县立女子师范学校读书。九一八事变后，积极参加抗日救国活动。1934年加入中国共产党，后在佳木斯从事秘密抗日活动。1937年，加入东北抗联第五军。她先在军部秘书处做文化教育工作，后调到第五军妇女团担任小队长和指导员。1938年夏，冷云强忍丈夫牺牲的巨大悲痛，告别刚刚出生两个月的婴儿，随第五军第一师部队西征，任妇女团政治指导员。

西征途中充满艰险，面对敌人的围追堵截，冷云带领妇女团成员在战斗和行军的间歇，发挥服务员和宣传



员的作用。她们用细密的针线修补战士们衣物，用坚定的歌声宣传党的抗日主张，鼓舞抗联将士们坚持战斗。她们与男队员一道，穿行在人迹罕至的原始森林中，克服了难以想象的重重困难。被日伪军围攻时，八位女战士并没有被敌人发现，完全可以渡河求生，但她们把生的机会留给大部队，选择了集体投江、壮烈殉国。她们是英勇抗击日本侵略者的巾帼英雄，是中华儿女与侵略者血战到底、决不屈服的光辉典范，是民族精神的集中缩影和体现。

王惠民，牺牲时只有13岁。13岁，花一般的年龄。在和平年代，13岁还是在母亲怀里撒娇、和同伴玩耍的年龄。而13岁的王惠民却已拿起钢枪，为了东北大地上苦难的同胞，为了中华民族的独立，与日本侵略者战死疆场，铸就了抗击外辱、尊严不可欺的历史丰碑。

还有杨贵珍、安顺福、胡秀芝、郭桂琴、黄桂清、李凤善，她们在民族存亡的生死关头，发出了“誓死不当亡国奴”的怒吼，实践了“宁可站着死，也不跪着生”的誓言，她们崇

高的民族气节、与日本侵略者血战到底而绝不屈服的英雄气概，永远定格在历史的星空。

（三）

简短的碑文，凝结的是东北抗联十四年的历史，是八女英烈身上闪耀的伟大抗战精神和东北抗联精神。东北抗联是中国共产党创建最早、坚持抗日时间最长、条件最为艰苦的一支抗日军队。从反日游击队到东北人民革命军、东北抗日联军，再到东北抗联教导旅，东北抗联坚持抗战十四年，沉重打击了日本侵略者的嚣张气焰，有效牵制了日本关东军大部分兵力，有力支援配合了全国抗战，在中国抗日战争和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中发挥了重要作用。十四年间，东北抗联谱写了一曲曲可歌可泣、惊天动地的英雄篇章，在生与死、血与火的磨礱中铸就了彪炳史册的东北抗联精神。2021年9月，中宣部发布的第一批纳入中国共产党人精神谱系的伟大精神，东北抗联精神位列其中。

为了新中国——革命烈士纪念碑碑文敬读

何功伟：放弃100多次活下来的机会

□ 李敏杰

何功伟是抗战时期党的一位重要领导人。1941年1月，担任鄂西特委书记的何功伟在湖北恩施被捕。在临刑的100余级石阶上，面对敌人“只要你回头，就能免于死”的承诺，遍体鳞伤、拖着沉重脚镣的他义无反顾，高唱《国际歌》，慷慨就义，还差4天才满26岁。新中国第一任监察部部长、曾负责南方局组织工作的钱瑛写下“忠贞那惜头颅倾，含笑刑场典范留”的诗句，深切缅怀这位昔日的战友。

“中国需要政治经济学家和革命家”

何功伟，1915年11月出生于湖北咸宁一个书香人家，童年时代在家乡接受了启蒙教育。1927年，何功伟在武昌的湖北省立第四小学读书。1930年夏小学毕业后，考入湖北省立第二中学。九一八事变后，他在同学中发起组织读书会，常以文天祥、岳飞等为榜样，以“天下兴亡，匹夫有责”共勉，并组织救国宣传活动。他曾读到日本首相田中义一给天皇的奏折：欲征服中国，必先征服满蒙；欲征服世界，必先征服中国。为了让全国人民认清日本灭亡中国的险恶野心，何功伟拿出自己的生活费翻印《田中奏折》，向学校、工厂散发。

1933年7月，何功伟参加全省初中毕业会考，以第一名的成绩考入湖北省立武昌高级中学。为了寻求救国真理，他经常出入邹韬奋主办的生活书店，阅读《共产党宣言》等马列著作和艾思奇的《大众哲学》等进步书籍。通过参加生活书店组织的读书会，他结交了一批爱国的青年朋友。在革命浪潮的初步锻炼和马列主义的启蒙教育下，他开始树立革命的人生

观，毅然放弃了做“爱迪生第二”的志向，决心投身于民族解放运动。他常对同学说：“当前读书不能救国，科学也不能救国，中国需要政治经济学家和革命家。”

“家国不能并顾，忠孝不能两全”

1935年，日本帝国主义发动华北事变。北平爆发了一二·九学生爱国运动。消息传到武汉，何功伟奔走于武汉各学校，参与组织并建立了武汉中等以上学校抗日救国联合会，担任该会的常务理事。他和其他同学一起组织了武汉大、中学校学生声援北平学生的示威大游行。在连续4天的大游行中，他都担任游行纠察队总队长。国民党省政府为了阻止学生示威游行，指使湖北省建设厅采取“封江停渡”的措施。学生去省政府请愿，与当局发生了冲突，何功伟挺身而出，带领学生坚持斗争，并取得最终胜利。在斗争的实践中，他成为武汉地区学生运动的重要领导人之一。不久，何功伟的父亲来到武汉，斥责他应明哲保身。他对父亲说：“家国不能并顾，忠孝不能两全。”

由于何功伟积极领导学生爱国运动，引起了国民党反动政府的仇恨，他被迫离开武汉。在上海经同乡前辈钱亦石介绍，何功伟参加了全国学联的工作，担任常委职务。他每天为学联起草文件、处理来往信件，并常在《学生呼声》等刊物上撰写时事评论。1936年8月，经胡乔木和唐守愚介绍，何功伟加入中国共产党。七七事变后，上海成立了青年抗日救国服务团，何功伟任该团的组织部部长，多次组织全市性慰问前方将士的集会等

活动。他的住处除了一张床以外，便别无他物，但他却总是以饱满的热情不知疲倦地工作着。

“在任何情况下都要保持无产阶级的革命坚定性”

1937年11月，上海战局危急，党组织决定派何功伟回湖北工作。12月，何功伟被任命为湖北省工委农委委员，由董必武介绍到湖北战时乡村工作促进会任秘书，主持会务。1938年3月，何功伟调任武昌区委书记，他深入基层，恢复和建立党的组织。6月，中共湖北省委正式成立，何功伟任省委委员。7月，省委根据党中央“有计划的建立几个基干游击队与游击区”的指示精神，派何功伟回咸宁开辟鄂南地区的工作。8月，省委决定成立鄂南特委，统一领导鄂南工作，何功伟任特委书记。1939年9月，中共南方局派何功伟到鄂西工作，先后任中共湘鄂西区党委宣传部部长、湘鄂西区党委书记。由于政治环境的日益恶化，何功伟根据南方局指示，结合鄂西实际情况主持制定了《革命气节教育提纲》，写道：“在任何情况下都要保持无产阶级的革命坚定性，严格遵守党的纪律，保守党的秘密。如果被捕，在监狱里和法庭上亦要坚持斗争，直到牺牲自己的生命，决不能叛党。”1940年6月，日寇出动大批军队，从武汉直犯宜昌。接到上级指示后，何功伟夜以继日地安排我党在宜昌的同志分批撤离，直到敌机投下燃烧弹，市内火光冲天，他才最后离开。8月，何功伟到达恩施后，被任命为中共鄂西特委书记。

“儿除慷慨就死外，绝无他途可循”

1941年1月皖南事变后，盘踞在鄂西的反动派进行了疯狂的大搜捕。由于叛徒告密，何功伟于1941年1月20日不幸被捕，先后被关押在恩施城内鼓楼街16号和城外方家坝等地。敌人先后使用各种伎俩迫其就范。面对火烙铁、老虎凳等刑具，何功伟态度从容，慷慨陈词，痛斥国民党破坏团结抗日，破坏统一战线的罪恶行径，使敌人的每次审讯和拷打都归于失败。朱怀冰等国民党“高官”“名流”曾先后来到方家坝，对何功伟大谈“共产主义不适合中国国情”，继而恶毒攻击我陕甘宁边区政府。何功伟斥责道，你们这些鬼话叫谁相信呢？敢不敢组织一个参观团去边区看一看？驳得这些“说客”哑口无言。

敌人告诉何功伟，只要交出共产党组织名单，省府委员、秘书、全省青年领袖、上大学和出国留学等任其挑选。何功伟对这些高官厚禄的诱惑报以冷笑，断然不与这帮民族败类同流合污。最后，陈诚把何功伟的父亲接到恩施，企图利用骨肉之情来软化他的革命意志。老人在恩施40多天，往返监狱探望和劝说儿子10余次。何功伟在给父亲的信中写道：“儿除慷慨就死外，绝无他途可循。为天地存正气，为个人全人格，成仁取义，此正其时”“纵刀锯斧钺加诸颈项，父母兄弟环泣于前，此心亦万不可动，此志亦万不可移”。

1941年11月17日，何功伟被敌人押到恩施方家坝后山五道洞刑场。在临刑的100余级石板上，每上一阶，敌人便问：回不回头，回头可免于死。何功伟坚定地走完了眼前的这100多级台阶，放弃了100多次活下来的机会，英勇就义。